

書評

帖木兒之後：論多極化世界的穩定

After Tamerlane: Stabil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嚴涵如 *Han-Ju Yen*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Master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John Darwin 的《帖木兒之後》(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 一書，揭露的是過往以國家作為歷史呈述的中心點或是以帝國為概念的論述方式的不全之處，事實上歷史是具有主觀意識、選擇性之下的產物，並且歷史是一個時代、許多事件的縮影。也就是說過往的歷史與現今實際上是具有前因後果的因緣存在，過往當代的事實完整呈現要藉由當時的多元複雜性來展現。此外，John Darwin 所強調的去殖民化概念來詮釋歷史在本書當中嶄露無疑，尤其在本書章節安排中可得知，各章節是以時代加以區分，並聚焦於帖木兒死後，終結歐亞帝國型態應運而生的歐洲、中亞（伊斯蘭）、遠東三區平衡狀態與其發展，從而擺脫了過往以歐洲作為中心，與以線性方式描述世界史的模式。

本書中還可觀察到兩個重點，其一為是積累效應所產生的效果，這正彰顯了歷史為具多重因素的因果聯繫網絡，亦即「羅馬並非一夕造成」的思維，多重因素積累所產生的衝擊就是產生變動的時機，例如十八、九世紀工業革命影響亦非一蹴可幾；其二為制度的變革，當制度無法符合時代需求或是當其走到極致後，制度的改變與不改變都會對於後代產生無法評

估的影像力，如在 1880 年代，中國與日本兩國在歷經 1840 年代以後的歐洲衝擊之下面臨制度變革的選擇，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都是內憂外患下的產物，但兩者最後導致國家發展與歷史走向步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John Darwin 將時代區分分爲九個區隔：1405 年（十五世紀）帖木兒死後的狀態；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意義重探；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東西方均勢狀態以及歐洲式經濟改革時期；1750 年到 1830 年代地緣政治、文化與經濟上的歐亞革命，最終將歐洲正式帶往世界中心的過渡期；1830 年代到 1880 年代，從「歐洲」走向「西方」，以其與此同時亞洲與西非的衝擊與發展；1880 年代到 1914 年，自由貿易模式與全球殖民主義的確立；1914 年到 1942 年，經歷兩場世界大戰，美國的崛起與歐亞舊制度的瓦解；二十世紀後半，冷戰時期的美國、蘇聯兩帝國兩極對立時期；廿一世紀至今，全球化世界走向帖木兒死亡後的多元、均勢狀態。

John Darwin 藉由 1405 年帖木兒死後隨之瓦解的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作為檢視媒介，歐亞在此後分爲歐洲遠西諸國、中亞信奉伊斯蘭的區塊與以儒家文明爲主的遠東三大均勢狀態，事實上，這三大區塊之間的界線會隨著時間或是文化認同傳播變遷而存有灰色地帶，但大體上未來便以此三大區塊作為發展的粗略分界點。突破過往的歐洲中心觀，John Darwin 試圖呈現的是各個時期的歷史面貌，歷史並非點與線的線性發展，而是由多重點與線交織而成的複雜脈絡，雖說如此的區分方式不免還是有著簡化的疑慮，但由此去理解歷史的發展脈絡，實際上是可行且實際的嘗試。要解釋的是，此時的「歐洲」範圍還侷限在地理位置所理解的區塊，此後在歐洲進入美洲、澳洲與非洲南部締造的新歐洲出現後，讓「歐洲」得以向東方與西方延伸拓展爲「西方」的概念。在 1405 年之際，歐洲是經濟復甦擁有成熟跨地區經濟、由諸多基督教國家所組合而成的鬆散聯盟以及具備共同社會、政治體制認知的區塊；伊斯蘭地區則擁有豐富文化遺產及掌握貿易路線要塞，1405 年正是伊斯蘭地區活躍的階段，但在戰亂與天災的影響下，商業活力在此時呈現衰退現象；東亞地區以中國爲主呈現一統性的狀

態，體現在中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鞏固國內貿易體系上，以及由此因運而生的層級與中央土地掌控體制。

在十五、六世紀，地緣政治與概念的轉變讓原本保持三大分區均勢狀態的情勢有所變動，雖然在十六世紀，這些轉變造成的潛移默化情勢還不明顯，但此時代正替十七世紀的發展鋪上基礎，且歐亞三大文明區塊仍是壁壘分明地各自發展。此時期歐洲國家，尤其葡萄牙、西班牙與俄羅斯等國分別拓展海權與陸權，培養地緣政治上的後續影響力，與此同時，歐洲內部也正面臨宗教改革帶來的壓力；伊斯蘭國家在此時凝聚力更強，並在擴張主義驅動下，結合伊斯蘭信仰世俗化達成的團結力，進一步建立鄂圖曼聯邦的基礎；在東亞，兩個主要的國家－中國與日本，不約而同地走向封閉的路線，中國強調自身文化一統性與拒絕對外通商，而日本則是進入幕府對外鎖國時期，兩國的內政外交模式共同建立了當代東亞秩序。

雖說歐洲在十六世紀正式探索美洲「新世界」，但其十七世紀的內在政經條件還不足以支撐它更進一步擴張，且此時期對於「新世界」探索的回饋仍舊處於不可知狀態，維持歐洲「舊制度」的成本也無異於是一大經濟與文化負擔，讓新大陸探索的殖民擴張隨之侷限；伊斯蘭世界則沿襲上世紀的擴張發展態勢，但逐步走向內向、保守路線，軍事、政治與經濟上的頹勢讓鄂圖曼帝國產生無法避免的沉重壓力；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在新政權成立後呈現蓬勃發展與鞏固態勢，雖說內部發展而成的龐大經濟、政治體得以安然度過接續的 250 年，但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較，接下來的成長態勢遠遠不及。因此也可得知，即使國家或是區塊維持穩定發展，但相較於其他區塊與國家若處於相對弱勢，便會在整體上呈現衰弱態勢。

經歷十五到十七世紀，三大區塊在基礎發展上走向不同的道路，相較於伊斯蘭與亞洲區塊，歐洲「相對」呈現較開放的貿易、外交路線。在 1750 年代到 1830 年代間，這樣的不穩定均勢下各自發展的趨勢被歐亞革命所打破，歐亞革命包括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的三場革命，此三場革

命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為未來歐洲的心理優越感與實際支配優勢埋下伏筆。在「新歐洲」區塊加入後，法國走向頹勢、英國相對崛起，兩大未來重要的國際關係行為者－俄羅斯與美國也在此時歐亞舊世界均勢劇變之際浮上檯面，歐洲藉由地緣政治拓展得以孕育自由貿易的雛型、佔領與殖民歐亞外的「外圍世界」，在經濟、軍事、工業、速度等方面持續累積挑戰東亞世界的實力；中國在自給自足的供應鏈下，缺乏工業化動機，並受到以皇帝為世界中心的圍限，即使持續發展，遠不及蓬勃發展、積累實力的歐洲諸國；伊斯蘭世界在軍事、經濟上的挫敗，似乎在現在的眼光在當時似乎可以追尋歐洲路線而有挽救的機會，但當時連歐洲都不能得知自己的發展路線能夠快速積累實力，更別提急於挽救伊斯蘭世界頹勢的穆斯林思想家。此際，隨著歐洲懷疑主義、實驗精神與對時空看法的變動，以及伊斯蘭世界與東亞世界的相對低迷，讓歐洲的「進步史觀」路線步上了不可逆的道路。

經由將近一世紀的準備，歐洲在 1830 年代物質實力大為增強，加諸新歐洲的加入，歐洲在此時正式轉變為現代「西方」概念的雛型。在主要強權主導下的維也納協調體制，讓西方人認為戰爭或是武力手段是維持均勢的必要手段，也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此時，歐洲有幾個層面的重大變革：政治與體制上，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興起以檢討過往舊制度的發展極限，國家更加追求穩固、屹立不搖的政治體制；經濟上，世界經濟進一步穩固及輔以交通科技進步，讓西方在經濟上獲得凌駕東亞與「外圍世界」的決定性優勢；新舊世界與體制的結合，加上人口大量移入，讓美國在此時具備有利發展條件。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在 1880 年代感受到內憂外患的威脅，不約而同走上改革的路線，但規模大不相同，也讓兩國自此走向一段不同的發展歷程。伊斯蘭世界鄂圖曼帝國的地緣位置劣勢，讓其更加飽受瓦解與瓜分的壓力，改革失利所付出的龐大代價更是讓其一蹶不振；同時期的埃及與伊朗也走向變革之路，埃及社會體制的劇變讓民怨四起，加上外債的壓力使得埃及反而成為外國宰制的羔羊，伊朗除了變革

之外，藉由地緣戰略的優勢位置，獲得了暫時的苟延殘喘的機會。不過整體來看此時的發展，歐洲（西方）與亞非國家在科技、財政與人口資源上的差距正逐漸迅速拉大。

1880年代後，西方世界將有形、經濟、文化力量的全球性階層體制加諸於全世界，蓬勃的歐洲支配體系更加強化歐洲在各方面的優越感，全球殖民主義泡沫直到1914年第一次大戰後才正式逐漸走向泡影。不過西方對於未來與世界發展還是抱持著相當的隱憂，這也是他們認同種族隔離與控制新征服民族的最主要因素。1880年代後，歐洲人在非洲海岸商業幹道日益熱絡、國內現金資金供應、非洲部份地區具有珍貴礦物，以及背負文明解放的「神聖使命」等因素催動下，進入非洲的大規模外交協議的瓜分時期。1900年代，世界態勢維持當代五大強權－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與法國的競爭性共存，全球各區塊似乎只待列強談妥瓜分模式。美國在1904年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延伸了門羅主義的概念與意義，但同時又對當時歐洲全球殖民主義抱持著不安的立場；俄羅斯在穩定發展下穩固現代帝國體制的所有關鍵要素，正式走入全球殖民舞台；英國在1880年代後被迫需正式確立其勢力範圍主張，廣闊的勢力範圍也成為尾大不掉的負擔，從而使其走向相對衰弱之途；德國的地緣位置使得其即使不斷追求立足之地或是海外貿易，主要的經濟利益還是集中在歐洲境內；法國雖有強烈企圖心，但是人口成長停滯、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國內經濟潛力薄弱、地理位置不佳等因素，讓其外交立場搖擺不定。全球市場經濟的形成促進倫敦作為全球經濟中心，但全球經濟自由貿易理論低估經濟發展產生的摩擦及不穩定性，都讓全球經濟在此際發展蒙上些許陰影的因素。歐洲以外的世界，尤其指殖民地區塊，在歐洲以強勢文化入侵與高姿態挫敗之下，走向不同的文化反抗路線：其一為師法歐洲的文化變遷模式，不過這需要具備讀寫能力強大的精英階層作為殖民當局與當地社會的中間人；其二為宗教復興，如伊斯蘭教除淨化之外還希冀達成某種程度的

現代化，印度教也出現整頓與淨化趨勢；其三則是將歐洲種族主義投射在自身身上，認為自身需要改造與轉化。東亞由於距離歐洲較遠、與歐洲的貿易量也不及其他區塊，再加上舊有文化、政治體制仍具備一統性，讓歐洲無法輕易將東亞（尤其中國）納入殖民地範疇。中國在免遭列強滅亡的內在、外在因素複雜，在清朝覆滅之後隨之建立的新體制也讓中國臣服於歐洲之下的命運終結；日本在此時興起領導亞洲的天命理論，加上西方一直以來過於低估日本的實力，以及地緣政治位置優勢，使日本得以逐步侵略周遭區塊完成對於本土的環狀防禦與穩固經濟發展路線。

1914-45 年間的兩次大戰打破舊有英國、俄羅斯、德國、法國、美國五強，以及新崛起的東方勢力日本彼此在大體上維持的合作關係，並催生出新的國際社會觀、打亂本來就不穩固的秩序。由於在國際秩序規則重構上未有廣泛的共識，使得新文化的孕育成為本土路線，緊密結合領袖與人民以團結抵禦外敵。兩次大戰事實上就像接連在一起的戰爭。第一次大戰導火線在於列強未能維持瓜分默契處理巴爾幹問題，顯示未盡完善的「歐洲國際體系」及未能預料到的總體戰爭後果，協約國（俄羅斯、法國、英國）與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之間的戰爭很快演變成全球戰爭，1917年美國參戰、俄羅斯崩潰，爾後的 1918 年在歐洲問題未解決之下進入休兵期。1919 年的巴黎和會實際也並未解決問題，只是暫時擱置問題，不過第一次大戰可以說是將歐亞舊式帝國正式推入瓦解的火坑，浴火重生的是各民族的建國與革命問題：埃及、敘利亞、土耳其、印度、中國、俄羅斯等等。戰間期世界面臨的是一個破碎的秩序，舊帝國主義雖瓦解但仍舊強撐，直至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才讓問題的急迫性更加浮現。新式帝國主義納粹德國追求生存空間與日本試圖建立東亞商業帝國的野心，促使了破碎的世界秩序全面崩盤以及第二次大戰的爆發。

經歷兩次大戰後的歐陸千瘡百孔，美蘇兩強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讓美國支持舊有帝國殖民地持續保持地緣戰略以對抗蘇聯的擴張，不過在此時，原本的殖民地概念出現了轉化。亞洲與非洲在此時期歷經去殖民化的

過程，摧毀原本以歐洲為中心的帝國秩序以及特權機構，去殖民化在地緣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文化上與人口上造成原有的全球秩序瓦解。1955年在印尼萬隆所舉辦的「亞非會議」雖啓發不結盟的第三世界與去殖民化的精神，但實際運作卻難處重重，例如帝國殖民時期將不同民族捆綁在一起以利統治的方式，在帝國抽離後出現日益的地方性、地區性衝突。亞非此時期值得注意的國家有：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對內達到統治權高峰卻因政策方向錯誤導致中國經濟破壞，對外無法制衡美國對台灣的幫助並且與日本又有嚴重分歧；日本在戰後成為美國制衡中國與蘇聯的亞洲平台，得以在經濟上與美國相連結；印度無法擺脫舊殖民時期遺留的主權、政體與經濟問題；東南亞國家像是印尼、越南即使到了美蘇冷戰時期還是脫離不了被帝國掌控的問題，內部仍需面臨種族與宗教上對立、政局不穩等問題。非洲無法仿效利用民族主義集聚力量，但創造了「部落」的概念讓非洲精英階層得以施行影響力以及建構權力，以對抗白人的種族隔離與強化白人政治支配權的狀況，不過內部還是在非洲南三分之一地區有著白人所統領的緊實集團，外部也有後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中東在此時期的去殖民化運動也是不盡順利，由於戰略位置與資源的問題，讓舊有歐洲勢力不願隨二次大戰結束而輕易退出，「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也無法順利解決地區內統治精英的敵對心態，以及民族、宗教、社會上的對立，還需遭到以色列建國所遺留的巴勒斯坦問題衝擊。

冷戰時期，由於美國與其他國家出現懸殊的有形國力差距，以及擁有核子技術與運用原子武器的能力，讓美國誕生具帝國本質卻缺乏帝國之名的強大體制。1950年代，全球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已無法阻攔美國的影響力，加諸美國在經濟、文化方面的軟實力支撐戰略武力方面的硬實力，讓它得以在影響範圍之下運作美國支配下的和平。蘇聯主要掌握有利的歐洲地緣優勢，以東德威脅西歐的心臟地帶，得以抵銷美國在高科技武器上的領先優勢，但是過於擴大勢力範圍，反而成為蘇聯在經濟上、政治上、人

口上的沉重負擔。美蘇兩強在冷戰時期之爭有五大特色：1962年後，美國或蘇聯都無意直接挑釁；兩強在經濟實力存有強弱落差；兩強爲了嚇阻對方不斷擴張的勢力範圍的邊界區，局勢一直十分不穩；相互競爭讓兩強遭受挫敗；兩強都無法有力控制其下的附屬國。在冷戰混沌未明的未來之中，蘇聯內部改革無法順利解決沉重經濟負擔使其在1990年步上瓦解之路，眼見美國成爲冷戰後的超強，讓美國更認爲其對世界政治、經濟，尤其是對於歐亞地緣政治上所需要扮演的管理角色責無旁貸。

雖說美國內外部都有許多對此感到反感的聲浪，但無法否認的是越來越難以抵抗美國的影響力，且目前也還尚未出現能夠取代美元作爲全球經濟貨幣中樞的角色，雖然有各種跡象顯現會出現新的對手，但至少現在還處於未知狀態。我們無法將此種美國的帝國型態與英國維多利亞帝國型態所受到的限制相比擬，臆測未來也並非能夠說得準確的事情。重省過往的歷史，可理解的是現今經濟、體制、價值觀、權力、宗教等方面分歧上的差異是源自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並沒有簡單明瞭的帝國興衰史可以講述，帝國實際上是多型態的形體，不論是農業帝國、奴隸兵帝國或殖民帝國，帝國都存在於各個時代中，只是型式、生長期不同，展現出的活力或樣貌也大不相同。從歷史中可學到的主要是兩個概念：其一爲，屹立不搖的帝國往往是將舊體制結合新方法加以改革、修正，而非全盤打翻就有體制走上新道路，並且能夠在歷史洪流當中塑造共同的價值觀與習俗來統領社會；其二就是，世界史所彰顯的意義在於沒有單一規範、制度、統治者能夠套用到整體社會，世界是不斷保持多元的運作，這也就是作者所說，由此看來，我們依舊活在帖木兒之後的陰影之下。